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下

黄宣民 陈寒鸣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儒学发展史.下/黄宣民,陈寒鸣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034—2271—3

I.中… II.①黄…②陈… III.儒家—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4815号

责任编辑:韩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32

字 数:2200千字

版 次: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28.00元(上、中、下)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上

序	刘泽华	(1)
绪论		(1)
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儒学演进		(1)
二、经世致用: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一		(10)
三、不断创新和自我改造: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二		(25)
四、儒家伦理与宗法社会		(34)
五、从传统到现代的考察——以儒家“民本”传统为例		(46)
第一章 孔子和早期儒学		(117)
第一节 上古礼乐文明与原始儒学		(118)
附录一] 从巫祝文化到礼乐文明的历史转变		(137)
[附录二] 神守、社稷守与“儒”及儒家的产生		(148)
第二节 西周王官之学的确立及其衰微		(166)
第三节 齐鲁文化与儒学的诞生		(177)
第四节 儒家开山祖孔子与六经		(188)
第五节 孔门弟子与早期儒学的传播		(215)
[附录一] 颜回与“颜氏之儒”探微		(232)
[附录二] 论孔门后学的分化		(240)
第六节 思孟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257)
第七节 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		(275)

[附录一] 郭店楚简与《中庸》	(301)
[附录二] 郭店楚简与“君子慎独”	(327)
第八节 荀卿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336)
第二章 秦代的儒生与儒学	(363)
第一节 秦初的文化政策与儒生的任用	(363)
第二节 秦代刻石及简文所见的儒家思想	(374)
第三节 秦代儒生的仕学分化与儒学的官私并存	(381)
第四节 “焚书坑儒”与先秦儒学的终结	(386)
第三章 汉代儒学：封建社会官方儒学的建立	(391)
第一节 汉代儒学复兴及其历史地位	(392)
第二节 “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408)
第三节 皇权与经学——儒家经籍的法典化	(438)
第四节 神学化的经学思潮	(451)
[附录] 汉儒谶纬神学中的科学内容	(466)
第五节 儒学的神学化与汉儒的造神运动	(474)
第六节 今古文经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493)
第七节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理论体系	(517)
[附录] 《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	(550)
第八节 《孝经》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563)
第九节 政治经典与经典政治：《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	(583)
第十节 郑玄《三礼注》及其儒学史意义	(614)

中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学	(663)
第一节 经学与玄学	(664)
第二节 南朝玄学的蜕变与礼学的复兴	(690)

第三节 北朝少数民族的汉化及儒学的汉学特色	(703)
第四节 注疏经学	(711)
第五节 隋唐科举制与儒家义疏学的进一步发展	(719)
第六节 唐中叶及其后儒学发展的新迹像	(744)
第七节 敦煌儒学	(767)
第五章 道学兴起与两宋儒学	(784)
第一节 “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开端	(784)
第二节 “道学”、“理学”、“心学”定名缘起	(788)
第三节 儒学趣向的转化:义理之学的兴起	(796)
第四节 荆公新学的特点及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814)
第五节 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831)
第六节 苏氏蜀学学风与东坡易学	(869)
第七节 书院儒学教育	(890)
第八节 朱熹集大成的心性学说	(908)
第九节 理学化经学的典范: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927)
第十节 陆学的立世精神	(952)
[附录] 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	(967)
第十一节 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 ——南宋与道学相异趣的事功之学思潮	(975)
第十二节 “学圣”与理学在儒学史上的特殊贡献	(1052)
[附录] 宋儒孟子观述论	(1071)
第十三节 道学化的经学思潮	(1090)
第十四节 《伊川易传》的特色及其意义	(1107)
第十五节 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	(1122)
第十六节 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1176)
第六章 辽金元时期的儒学	(1186)
第一节 辽、金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及金朝儒学的特色	(1186)

第二节 西夏遵行儒学,“渐行中国之风”	(1192)
第三节 元代“用夷变夏”思潮与理学的官学化	(1195)
第四节 金华朱学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影响	(1206)
第五节 元代的朱、陆合流和陆学	(1237)
第六节 吴澄的“道统”论与经学	(1243)
[附录] 元儒吴澄对《礼记》的改编	(1248)

下

第七章 明代儒学	(1267)
第一节 朱元璋与洪武儒学	(1267)
第二节 朱棣的儒学思想	(1334)
第三节 朱学流变	(1347)
第四节 程敏政及其朱、陆“早异晚同”论	(1363)
第五节 王守仁心学及其对儒学的革新意义	(1405)
[附录] 阳明心学兴盛原因探析	(1414)
第六节 阳明心学与封建政治	(1424)
第七节 阳明哲学的视角	(1434)
第八节 王良的“百姓日用之学”	(1450)
第九节 平民儒者颜钧及其“大成仁道”	(1480)
[附录] 《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	(1511)
第十节 泰州王门巨——攀王一菴的哲学思想	(1522)
第十一节 韩贞的平民儒者风范与罗汝芳的理学思想	(1537)
[附录] 罗汝芳的平民儒学思想及其讲学实践	(1552)
第十二节 泰州王学后劲焦竑	(1576)
第十三节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1590)
第十四节 诸种思潮交汇下的汤显祖的思想	(1612)
第十五节 张居正与阳明心学	(1624)
第十六节 王湛心学与书院教育的再度辉煌	(1646)

第十七节 晚明儒者文士的“狂者胸次”	(1657)
第十八节 鹿善继与燕南王学	(1668)
第十九节 蕺山心学与晚明思潮	(1720)
第二十节 晚明清初的名节思潮	(1766)
第八章 兼综汉宋的清代儒学	(1781)
第一节 黄宗羲与清初启蒙儒学	(1781)
第二节 傅山“异端”思想的风骨	(1792)
第三节 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	(1809)
第四节 李颙与清初山林儒学	(1824)
第五节 康熙帝与清初庙堂儒学	(1832)
[附录] 庙堂理学的政治思想	(1841)
第六节 乾嘉汉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1852)
第七节 朴学化的经学思潮	(1878)
第八节 戴震披着“经言”外衣的启蒙学说	(1895)
[附录] 戴震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	(1912)
第九节 袁枚对正宗儒学传统的批判	(1922)
第十节 崔述与清代疑古儒学	(1937)
第十一节 晚清公羊学的兴起与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1972)
第十二节 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之学”	(1990)
第十三节 西学化的经学思潮	(2004)
第十四节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前瞻	(2021)
[附录]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2040)
结束语 :关于儒学的现代发展问题	(2051)
后 记一 陈寒鸣	(2074)
后 记二 黄 勤	(2083)

第七章 明代儒学

有明一代，尽管程朱理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居于统治地位，但与永乐年间三部《大全》的颁行而将理学统治推到如日中天地步相伴随的则是其学术思想生命力日益丧失。而从儒学发展角度来看，不仅元末明初愈益发展起来的和会朱、陆的思潮为明代后中叶阳明心学的兴起提供了内在理据，而且阳明心学之兴更对儒学发生了革新性作用。正是以晚明商品经济因素的滋长与市民阶层的形成社会背景，以富有创新活力的阳明心学为思想理论资源，明代中后叶以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为标志，出现了平民儒学。这种儒学由庙堂而返归民间、由经生文士所把持而回复为“百姓日用之道”的发展动向，无疑十分值得重视。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在晚明来华，带来了西学。他们不仅与中国的儒者士绅有广泛交流，而且还以其学阐释儒学，从而对其时的儒学发生了一定影响。此外，杨慎为代表的一派儒者则以博学见长，其所倡训诂考据之学风开启了清乾嘉汉学的先河。凡此等等，要皆表明明代儒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环。

第一节 朱元璋与洪武儒学

一、朱元璋与儒者文士

在中国历史上，以布衣起事而成功地开创了一代帝王之业的，大约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刘邦以马上得天下，又以《诗》、《书》安天下而出名，朱元璋所不同者，是他居马上抢攘天下之

时即已注意《诗》、《书》，重视发挥儒家学者的作用。^①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说：“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璽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

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在濠州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十四年(1354)，他带领徐达、汤和等24人离开濠州，自谋发展，从而开始其自创事业的艰难历程。

朱元璋一开始就注重网罗儒者文士。早在渡江前，他即已征用冯国用及其弟国胜、李善长等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元末结寨自保”^②。朱元璋进军滁阳，途经妙山时，冯氏兄弟“着儒服”来见，朱元璋谓：“若书生耶？试为我计安出？”国用曰：“建康，龙蟠虎踞，帝王都会，自古记之。幸而近我，其帅懦弱不任兵，宜急击下其城，踞以号召四方。事仿仁义，勿贪子女玉帛若群竖子者，天下不难定也”^③。朱元璋遂令其为幕府参谋，计议大事。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到军营求见。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④。初谒朱元璋，即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殷殷期其成为当今的汉高祖刘邦。朱元璋对他甚为信任，留在幕府掌书记。

渡江后，朱元璋更大力罗致人才，“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⑤。至正十一年(1355)，兵克太平，儒士陶安、李习、潘庭坚、梁贞等出城迎接。陶安，博涉经史，尤深于《易》，与朱元璋语，甚合其意，遂留参幕府，拜左司员外郎，从克金陵，升左司郎中；李习，自幼老成持重，治《尚书》，又旁通群经，攻性理之学，被朱元璋用为太平府知府；潘庭坚，元末用荐为富阳县学教谕，朱元璋任之为太平府儒学教授，次年取金陵后改为中书博士；梁贞，元至正中为国子监生，后由国子伴读授太平路儒学教授，见朱元璋时，所言辄援《诗》、《书》，被命为江南行省都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取金陵，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各授官职。又因秦元荐而以书

聘陈遇。陈遇，博通经史，尤邃于先天之学，元末为江东明道书院山长。朱元璋称其“学贯三史六经，博览兵书百技，才兼文武，实我良辅”⁽⁶⁾。他与朱元璋相见后，希望其“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⁷⁾，被命筹帷幄，诸计划多秘不传。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徽州，召儒士唐仲实，问：“汉高帝、光武、唐太祖、太宗、元世祖一平天下，其道何由？”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归而未遂生息”，元璋深以为然⁽⁸⁾。又素闻儒士朱升之名，遂“潜就访之。升因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大悦，命预帷幄密议，“大抵礼乐征伐之议，赞画居多”⁽⁹⁾。

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兵克婺州，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寻复改为金华府，并在这里设置中书行省。自南宋以来，婺州就是理学中心。二百余年间，这里名儒辈出，人才济济，素有“小邹鲁”之称。朱元璋对婺州儒士特别重视。他召许元、叶瓚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莘、童翼、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诸儒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讲说经史，敷陈治道。辟范祖幹、叶仪。祖幹持《大学》以进，谓治道不出是书，并说：“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朱元璋善其言，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他对范、叶二氏甚加礼貌，命为咨议，然叶仪以疾辞，祖幹亦以亲老辞归⁽¹⁰⁾。十九年(1359)，朱元璋“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¹¹⁾。同时，又征王禕，用为中书省掾史，商略机务。王禕，字子充，浙江义乌人，尝师事黄潜，得其精诣，不仅与同门友宋濂俱以文章名世，而且是位积极用世、勇于任事的儒者⁽¹²⁾。朱元璋对他“礼之甚，每见，称子充而不名。间与言文章，辄称善”⁽¹³⁾。朱元璋下婺州前，虽已任用了不少儒者文士，但他们多非职业儒者如冯国用兄弟、李善长等，且所进之言基本属于策略方面；而下婺

州后,朱元璋结纳的金华学者尽皆纯儒,他们不仅在策略方面向元璋提出诸多建议,而且更直接对其施加儒学影响。因此,可以说,“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¹⁴⁾的朱元璋,自下婺州后才真正在较深层次上与儒学接触,接受儒学、尤其是理学思想的影响。

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闻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皆国士,特遣宣使樊观赍币礼征聘之。四人至建康,朱元璋喜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对他们语必称先生而不名。又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创置礼贤馆以处四先生及陶安、夏煜、苏伯衡等名儒。其时,朱文忠守金华,荐诸儒之有声望者王禕、许元、王天锡至,皆为朱元璋收用。不久,元璋即以宋濂为江南儒学司提举、王禕为江南儒学司提举校理,并令长子朱标从宋濂受经学。又授刘基、章溢为中丞,命叶琛为洪都知府。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吴王。在建置百官的同时,又遣起居注吴林、魏观待访求遗贤于四方,以期使更多的儒者文士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基、宋濂等出自浙东的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这对朱元璋的思想及他的帝业之成功均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朱元璋与元廷有别,同当世举事诸豪亦有异。元廷虽标榜崇儒重道,但实际上并不真正重视儒学和儒家学者。“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¹⁵⁾。所谓“九儒十丐”之说表明了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儒者地位低下的境遇。迨至元末,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儒士们徒抱经邦治国之志,却只能“穷经积学,株守草野”⁽¹⁶⁾。他们一旦得遇虚诚纳士,注重发挥其作用的朱元璋,便自然会有喜结明主之感。陶安甫见元璋,即以为“我辈今有主矣”⁽¹⁷⁾;樊观奉书币造访宋濂,濂喜曰:“昔闻大乱极而真人生,今诚其时矣”,遂幡然应聘⁽¹⁸⁾。这大体代表了为朱元璋先后任用的那些儒士共具的心态。如果说朱元璋希望儒士们成为自己麾下的伊尹、吕尚、孔明,为成就自己的帝王之业效力,那么,儒士们投效元璋,则“以帝王事功期于始见之期”⁽¹⁹⁾,希望他成为当代刘邦,使天下由乱而治。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迎小明王至滁州,“中书省

设御座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刘基大怒，骂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遂不拜。适上召基，基遂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²⁰⁾。于是，“撤座不拜，遂辄龙凤年号”⁽²¹⁾。不仅仅是儒士与朱元璋存在着心态上的契合之处，而且更主要的是儒士们在引导、促使朱元璋与红巾军决裂并转向专制帝王化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元末政乱，诸豪并起，然多难成事。郭子兴任侠喜宾客，散家财结纳壮士起事，朱元璋曾为其部属，并被倚为亲信，以养女马氏妻之。但他“为人泉悍善斗，而性倖直少容”⁽²²⁾，且未几即病卒。韩林儿在刘福通等人扶持下被立为小明王，朱元璋亦曾听命之，但他本人并无大志，“听命刘福通，徒拥虚号，在外诸将卒不遵约束”⁽²³⁾。沔阳渔家子陈友谅，“少读书，略通文义”，但“性雄猜，好以权术取下”⁽²⁴⁾，且“无远大志，处兵戈间而急于珍宝”⁽²⁵⁾。徐寿辉业贩布，壮貌魁伟，被推为红巾军主，却“木强无他能”⁽²⁶⁾，竟久为陈友谅所挟。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²⁷⁾，起事称王后，“纵肆专命，擅官爵，制度僭似”，“骄侈淫佚，懈于政事”，“徒以好士要誉”。其手下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²⁸⁾。任为丞相的三弟士信，贪污无能，一味信用朋比为奸、弄权舞弊的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为参谋。杨维禎曾致函张士诚，尖锐地指出：“衅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患”⁽²⁹⁾。方国珍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八年即聚众数千人于海上，但他同元廷一直处于或降或叛之间，后同朱元璋亦复如此。明初见大事已定，遂降附朱元璋，被授为广州西行省右丞，食禄不之官，未几即卒于京师。曾自立为陇蜀王，后即帝位，定国号夏、建元天统的明玉珍，“性节俭，颇好学，折节下士”，重用刘楨等儒家学者，又“设国子监都教公卿子弟，设提举司教授，建社稷宗庙，求雅乐，开进士科，定赋税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³⁰⁾，似乎有番气象，惜其素无远略，始终偏安一隅。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玉珍病卒，以十岁子升嗣位；其后内乱不已，终于洪武四年为朱元璋所灭。

方孝孺曾将朱元璋与群豪做过一番比较。他说：元末，“地大兵

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指宋濂——引者注）而宾礼之。……群雄多嗜杀如货；独上御军有法，命将征讨，戒以勿杀，所至，民欢乐之。识者已谓天下不足平”⁽³¹⁾。由上述可见，朱元璋与群豪确有很大区别：他具备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善于审时度势，利用各种矛盾以发展自己。他又能以严明的纪律统率部队，每征战总要诫谕将帅勿嗜杀、勿贪子女玉帛，故而颇得民心。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能虚诚纳士，时时宣称“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³²⁾，十分注重发挥儒家学者的作用。这是他区别于群豪的最主要之处，也是他能在短短十四年间（1352—1368）便以一介布衣而成就帝王之业的重要原因。

身受元末黑暗政治之苦，目睹群豪蜂起之混乱，而力图用世，以期整个社会由极乱而渐至大治的儒士们，得遇朱元璋，自然不仅与其同患难，共命运，而且更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朱元璋的帝业竭尽全力。冯国用、李善长等建议占金陵以为根本，然后“出兵以临四方”，为朱元璋后来的不断向外拓展起了积极作用；朱升根据当时客观形势而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斗争策略，对朱元璋最终成就帝业更有重要意义。被朱元璋誉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陶安，为人谦和，不好名利，礼让贤者，积极帮助朱元璋招纳人才。据《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所记，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应聘至金陵，朱元璋问四人何如？已深受朱元璋器重的陶安对曰：“臣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朱元璋称其能让。陶安又在制礼定律等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作用。吴元年，初置翰林院，朱元璋首召陶安为学士。时征诸儒议礼，命陶安为总裁官，寻与李善长、刘基等删定律令。洪武元年，朱元璋与陶安等论学术，安曰：“道不明，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何从治？”陶安顿首曰：“陛下所言，可谓深探其本矣”。至于刘基更“受心膂之寄，柄帷幄之筹”，不断向朱元璋密陈取天下之计。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城之内变，尽皆刘基所谋。“彭蠡之役，

战炮声击裂，犹天雷之临首，诸军呐喊，虽鬼神也悲号自旦日暮，如是者凡四”，而刘基与朱元璋始终稳坐舟中，岿然不动，故而元璋称刘基为“同患难”的“吾之子房也”⁽³³⁾。因此，朱元璋帝业的成功确实同儒家学者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

朱元璋深知儒士有助于其创立政权，故在开创帝业的过程中大力吸纳各方儒士，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甚至对来自敌对营垒中的儒士也能以礼相待，如詹同，字同文，初名书，婺源人。元至正中举茂才异等，除郴州学正。元末遇乱，居家黄州，后被陈友谅任为翰林学士承旨。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攻克武昌，召为国子博士，赐名同。“时，功臣子弟教内府，诸博士治一经不尽通贯，同学识淹博，讲《易》、《春秋》，最善应教。为文才思泉涌，一时莫与并”⁽³⁴⁾，后迁考功郎中，直起居注。明洪武元年，与文原吉、魏观等循行天下，访求贤才。还，进翰林直学士，迁侍读学士；六年兼学士承旨，与学士乐韶凤定释奠先师乐章，同年赐敕致仕，语极褒美。又如蔡子英为元至正中进士，扩廓帖木儿开府河南，辟参军事，累荐至行省参政。元亡，从扩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子英单骑走关中，亡入南山，然终被明兵捕获，押至京师。朱元璋久闻其名，故特命脱械以礼遇之。但蔡子英不为所动，不仅不接受朱元璋所授官职，而且还上书申明誓死不降明廷之志。元璋览其书而愈益敬重，馆之仪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问其故，曰：‘无他，思旧君耳！’帝知不可夺，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从故主于和林”⁽³⁵⁾。

不过，朱元璋毕竟摆脱不了小生产者的褊狭心理，加以他本人又是位疑忌心甚重的人物，故而在夺取天下过程中，他自己广纳儒家学者，却严禁各级将官私自任用儒士，绝不允许儒者在将官周围议古论今，以免二者结合会影响其已经取得的权力，同自己分庭抗礼。立位称帝后，朱元璋对不受征聘，拒绝与其合作的儒者更不惜以严刑峻法予以制裁，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³⁶⁾。御制《大诰三编·秀才刳指第十》记载夏伯启叔侄之事道：

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人各截去左手大指，拿赴京师。朕亲问之，谓曰：“昔世乱，汝居何处？”对曰：“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曰：“家小挈行乎？”对曰：“奉父行。”曰：“既奉尔父行，上高山峻岭，下深沟陡涧，还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自后居何处？”曰：“红寇张元帅守信州，伯启还乡复业。”曰：“向后何如？”曰：“教学为生至今”。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体而已，其保命在君。……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在他忿，至于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今尔不能效伯夷、叔齐，去指以食粟，教学以为生，恬然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尔身何将怙恃？”伯启俯首默然。噫！朕谓伯启曰：“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为君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梟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妇仿效之风。”而伯启无对。⁽³⁷⁾

朱元璋还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³⁸⁾

洪武初年，国基方稳，朱元璋为维护其绝对专制的君主权，便大肆杀戮功臣元勋，同时对儒士文臣充满戒心。他屡兴文字狱，致使一般文臣无所适从，赵翼对之记曰：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禄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苏州府学训导林伯璠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

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表，以“体法乾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靡”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案：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³⁹⁾

朱元璋“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绝非由于听信勋臣的搬弄是非之言，而是由其专制君主的本性所决定的。他对那些追随多年，出生入死地为其建功立业的儒者不也是很猜忌吗？如前节所举刘基，在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乃“运筹帷幄”之“佐命臣也”⁽⁴⁰⁾。而既定天下，位居九五，朱元璋便无法忍受昔日言听计从的刘基的刚直了。尽管“子房”刘基深知共患难易、同安乐难，早在洪武元年八月就决定辞官归里，但朱元璋对他或召或放，始终不甚放心。⁽⁴¹⁾洪武八年三月，刘基病势沉重，朱元璋夺其俸禄，迫令归老还乡，并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中以威胁口吻写道：“君子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⁴²⁾。这就难怪李贽要评道：“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顾寝薄，以刚放”⁽⁴³⁾。

朱元璋还以特务手段监视儒臣。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